学术专论

继绝学而成圣：理学思维与错简论的形成和发展

张田生

[摘要] 宋元以来《伤寒论》文本诠释的兴盛和疑经思想的萌芽，以及明后期泰州学派的平民化思潮，是错简论出现的历史背景。方有执参照建道统、继绝学、疑经改经、反异端和成圣等理学思维，创建了错简论的体系。在此体系中，方有执拔高张仲景的圣人地位，主张张仲景之后医道中断而成绝学，通过编次《伤寒论》，恢复其原貌，自己继承了绝学，同时为了维护自己的正统，将成无己等医家视为异端，最后认为自己成圣。清初的喻昌以更加理学化的思维，发展了错简论的体系。错简论将医家的人生理想寓于医学理论创新之中，这是它能对清代医学产生巨大影响的观念因素。

[关键词] 理学思维　错简论　方有执　喻昌　建构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4）－01－0090－013

在中医伤寒学史上，由方有执提出而喻昌完善的错简论，[①] 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引发了清代伤寒学的争鸣。这在中医界早成定谳，被写进教材，成为一种常识。目前错简论的研究基本上是对中医理论演变的梳理，甚少涉及社会文化。事实上，医学并非仅是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而是与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基于此，我们想问的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医学理论，错简论与社会文化有着怎样的关联？错简论的建构究竟是方、喻二人的突发奇想，还是受当时某种思想观念的影响？如果是后者，那么，是在何种历史背景中形成的？其过程又是怎样的？这一系列问题，对于认识明清医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通过翻阅大量的文献，我们发现，方、喻二人是受了理学思维的直接启发而提出和发展错简论的，错简论的理论逻辑有着浓厚的理学色彩。本文的写作就是在文献的基础上，着力呈现在某种历史背景下方、喻二人对理学思维的吸收，以建构错简论的过程，[②] 同时揭示其间方、喻

[收稿日期] 2022-09-30
[作者简介] 张田生（1977—　），男，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曲阜 273100，zhangtsh1977@163.com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宋元以来中医知识的演进与现代‘中医’的形成研究”（18ZDA175）阶段性成果。

① “错简论”认为,《伤寒论》自王叔和整理以后，已经错简不堪了，应该重新订正，恢复《伤寒论》旧有的面貌。持此说者主要有方有执和喻昌等人。

② 关于理学对医学理论影响的研究，学界基本上聚焦于宋明时期，认为当时医家运用理学概念，构建了诸多医学理论，如理气阴阳论、太极命门水火之辨、先天后天根本之辨、运气学说之兴起等，参见黄吉棠：《论宋明理学促进中医学的

二人的心理世界。①

一、宋元以来伤寒学的发展和明代理学的平民化走向

中医界对方有执的错简论讨论甚多，但甚少有人分析错简论在明代后期出现的历史背景。②实际上，错简论之所以在这一时期产生，与宋元以来伤寒学的发展与明代理学的平民化走向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宋元以来伤寒学的发展

以《伤寒论》为中心的伤寒学研究，是从宋代开始的。由于官府对医学古籍整理和医学教育的重视，加上印刷技术的进步和疫病的流行，③宋代医家开始了对《伤寒论》的全面研究。到了金元，伤寒学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宋元时期伤寒学著作 116 种，伤寒医家 80 人。④其中代表性的医家及其成果有庞安时的《伤寒论总病论》、朱肱的《南阳活人书》、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王履的《医经溯洄集》等等。研究内容丰富多彩，研究方法多种多样。⑤到了明代，伤寒学进一步发展。明代伤寒学著作多达 115 部，伤寒医家 82 人。⑥方有执之前著名伤寒医家的著述有许宏的《金镜内台方议》、陶华的《伤寒六书》、吴绶的《伤寒蕴要全书》、汪机的《伤寒选录》等。研究方法有以症类证法、以方类证法、以经释论法等多种。⑦

总体来看，宋元到明前中期伤寒学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伤寒论》为基础，对伤寒病证的探讨，另一类是以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为代表的注疏研究。这两类研究都是以

发展》，《新中医》1988 年第 2 期；范景田、常存库：《宋明理学对中医基本理论的影响》，《中医药学报》1989 年第 4 期；徐仪明：《性理与岐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姚春鹏等：《宋明理学与中医理论嬗变》，山东大学出版社，2021 年。有些学者还分析了理学思维对医界的影响，如改经、争正统、门派之争等现象，参见孟庆云：《宋明理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影响》，《中华医史杂志》2002 年第 3 期。关于理学与错简论的关系，中医界也有人论及，叶发正主张，为了还原儒家经典本来面目，朱熹编订四书，方有执的错简论就是在这种思潮下产生的。何叶博等人指出，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之错简重订说、三纲鼎立说、《伤寒》所论不啻伤寒说等，皆与程朱理学渊源极深。他们的研究是有意义的，但失之简略，前者只是在著作中顺便提及，后者虽做专论，也仅就方有执的错简重订说、三纲鼎立等思想分别与朱熹的《大学》错简论和“三纲领”对比。叶发正的说法，参见氏著：《伤寒学术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90–91 页；何叶博等人的观点，参见何叶博等：《方有执〈伤寒论条辨〉的理学渊源》，《中华中医药杂志》2020 年第 8 期。

① 方有执和喻昌的研究成果不少。学界对前者的考察主要包括错简论的溯源、形成过程、内容、影响等方面，代表性的成果有万友生：《论风伤卫、寒伤营和风寒两伤营卫》，《江西中医药》1959 年第 11 期；陈大舜：《伤寒学派形成和发展中的三个关键人物》（二），《辽宁中医杂志》1983 年第 8 期；黄英志：《明清之季〈伤寒论〉研究的学术之争》，《辽宁中医杂志》1984 年第 11 期；等等。关于后者的研究，颇为兴盛，时至今日，相关著作已有几部，论文一百多篇，专门的喻昌学术思想讨论会也召开了不止一届，成果难以枚举。喻昌的研究大体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包括生卒、交游在内的生平事迹；二是医学成就，其中有宏观的整体考察，又有著述、医理和治验的具体研究；三是儒道佛对喻昌及其医学理论的影响。参见 Volker Scheid, “The Neglected Role of Buddhism in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in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Viewed through the Life and Work of Yu Chang 喻昌 (1585–1664)”,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94.1（2020）: 1–28。在这些成果中，未有人从理学文化方面考察喻昌的错简论。

② 中医界认为，方有执以错简论开启了伤寒学的流派之争。叶正发在讨论伤寒学流派产生的原因时，指出方有执错简论的产生与当时流行的理学思潮有关，这种思潮指朱熹为还原儒家经典的本来面目而编订四书的活动。叶氏仅将理学思潮与方有执的错简论关联，并未进行系统论证。参见叶正发：《伤寒学术史》，第 90–91 页

③ 张瑞贤：《宋元时期伤寒学的原因、特点及地位》，钱超尘、温长路主编：《张仲景研究集成》（下册），中医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2003–2006 页。

④ 付元谋：《〈伤寒论〉研究专著书目记》，《成都中医学院学报》1982 年第 3 期。

⑤ 关于宋元伤寒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参见叶发正：《伤寒学术史》，第 58–70 页。

⑥ 付元谋：《〈伤寒论〉研究专著书目记》，《成都中医学院学报》1982 年第 3 期。

⑦ 欧阳兵：《明代〈伤寒论〉研究方法述略》，《国医论坛》1995 年第 6 期。

王叔和、林亿整理的《伤寒论》为基础，通过章句训诂来解释。这种研究方式在获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限制了医学理论的变革。

在此情况下，有些医家对上述研究产生了怀疑。“明初王履、吕复、黄仲理、汪机等家曾对王叔和编次《伤寒论》多有微词，陶华《伤寒琐言》对王叔和撰次、成无己注解亦多异议。”① 王履就认为，传世的《伤寒论》非张仲景原本，系王叔和编次过的，王氏将自己的认识掺入其中：“(《伤寒论》) 至叔和时已多散落，虽叔和搜采成书，终不能复其旧，然则今之所传者非全书也，明矣”；“叔和……既以自己之说，混于仲景所言之中，又以杂脉杂病，纷纭并载于卷首，故使玉石不分，主客相乱”。② 方有执的长辈且为同乡的余傅山，亦有类似的看法：“王叔和收拾于残篇断简之余，六经编次失序，或有将阳经混入阴经，或有将太阳误编于阳明者，或将阳明误编入少阴者。”他还批评成无己“不能辨答各经是非，顺文注释，略无缺疑俟后之意，仲景之书至此复不明于天下矣”，为此，余傅山“欲将《伤寒论》删其繁芜，撮其指要，重与编次，另为一编……其原本错简混淆彼此差谬者，悉为更正，使开卷了然无所疑，庶几仲景之心复明于千载之下”。③ 余傅山曾在歙县开馆讲学，有一定的影响，④ 按常理，方有执应该了解余氏的上述观点。

大体上，宋元以来伤寒学发展可以概括为《伤寒论》章句训诂式研究的兴盛和局限，以及传世《伤寒论》错简观念的萌芽。这就是方有执错简论产生的医学背景。

（二）泰州学派：明代理学的平民化走向

不过，仅仅上述医学背景，还不足以促成方有执错简论的产生。自宋代以来，张仲景不断被圣化，到明代后期，成为医界普遍认可的医学圣人，《伤寒论》成为圣经。在此情形下，要另辟蹊径，对《伤寒论》章句训诂式的研究提出怀疑，必须有新观念的强烈刺激。理学提供了这种思想资源。宋代以来的理学，发展到明代，因阳明学说而走向鼎盛。与此同时，理学也走出士大夫阶层，向全社会弥漫和渗透，出现了平民化的走向。主导这一走向的就是阳明后学泰州学派。

理学虽然在明代很兴盛，但在泰州学派之前，属于士大夫阶层的思想观念。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反对普通民众有担当天下的胸怀，要求他们“思不出其位”。以农夫、樵夫、盐丁、陶匠等下层民众为主体的泰州学派，冲破了这种边界，主张理学不仅是士大夫的学问，也是普通民众的日用之道，即“百姓日用之道”。⑤ 在这种思想中，“百姓”不仅指广义上的士农工商，而且指狭义上的广大下层群众，即“愚夫愚妇”；“道”不光有道德精神的内容内涵，还包含了人最起码的物质生活要求。⑥ 可见，“泰州学派不再把儒家的价值当作士大夫经过复杂修养过程才能达到的境界，而是把它作为百姓日用中就已实现着的、表现着的东西”。⑦ 由于这种平民特色，泰州学派在社会影响上超越了王门各派，遍及全国各地，王艮的弟子遍布 13 个省，其

---

① 欧阳兵：《明代〈伤寒论〉研究方法述略》，《国医论坛》1995 年第 6 期。

② 王履撰，邢玉瑞、阎咏梅注释：《医经溯洄集》之《伤寒三百九十七法辨》《张仲景伤寒立法考》，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2011 年，第 28、18 页。

③ 余傅山：《论医汇粹》二《对〈伤寒论〉的认识》，歙县中医医院翻印，1989 年，第 8 页。关于王履和余傅山的《伤寒例》错简的说法，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洪必良就有专文论述，参见氏著：《〈伤寒论〉错简重订派补识》，《安徽中医学院学报》1994 年第 2 期。

④ 关于余傅山的讲学，参见汪翔、郭静：《医理学理交融：明代新安医家讲学初探——以〈论医汇粹〉为中心的考察》，《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1 期。

⑤ 陈来：《泰州学派开创民间儒学及其当代启示》，《江海学刊》2020 年第 1 期。

⑥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张岂之修订：《宋明理学史》（中），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1124、1125 页。

⑦ 陈来：《泰州学派开创民间儒学及其当代启示》，《江海学刊》2020 年第 1 期。

中安徽 23 人，江西 35 人。①

自汉代以来，医家被打入方伎之列，社会地位较低。虽然宋代以后，医界不断圣化张仲景，将伏羲、神农和黄帝三位儒家圣人变成医学之祖，以壮大声势。然而，方伎的身份标签，使得医家地位的上限很低，无法与儒接近。而泰州学派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种情况，医家也可成圣，医学成为“百姓日用”中的圣人之道。对于渴望提升自身地位的精英医家，这些显得尤为重要。这些直接为错简论体系的搭建提供了思想资源。

二、方有执的理学思维与错简论的形成

关于方有执的生平，除了《伤寒论条辨》中的点滴自述外，其他资料甚少记载。自述显示，他早年志于儒，后来因病而弃儒习医：“愚虽不敏，窃尝愿学孟子之所学矣，以疾厄夺，因愿学仲景。”② 可见，方有执出身理学。

在著述中，方有执经常引用理学来论证医理。（1）用儒家经典来诠释医理。在回答关于十二经脉的问题时，方有执首先正面说明了十二经脉的原理，接着用《论语》的有关说法批评反对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③ 在回答“阴阳易、劳复孰轻重”的问题时，方有执先是指出二者没有轻重之分，都是“死道”，治疗也是“死中求活，期一二于千百之意”，继而用孟子的说法指责犯此病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君子无轻生以自取可也。”④（2）用程朱理学来证实医学理论。有人问如何“读《伤寒论》”，方有执回答：“当如程子、朱子教人读《论语》法。”⑤ 方有执还用“一本万殊”等理论解释医道的渊源：“一本万殊之谓道……医之有道，自《本草》《素》《灵》《难经》《伤寒论》渊源而来，数千年矣。”⑥（3）用泰州学派“百姓日用之道”来阐发医道和医务：“道者，日用事物当然之理也。理在事物，是故君子不能外事物以言道。医之事物，治病用药是也……医家日用常行之所当然，此之谓道也。”⑦“道不离日用间。今也只在俯仰天地间，寒温冷热中，寻常眼面前，穿衣吃饭上，着实备细跟寻，然后质之先圣之格言，不复迷惑于淫邪之虚妄。”⑧

不过，在错简论体系的建构上，方有执并非套用理学的某家理论，而是借鉴了理学的思维。从唐代韩愈的新儒学，到宋代程朱理学，再到明代阳明心学，大体上都有一套共同的思维逻辑，就是首先建立一个道统，然后主张道统自某位圣人而中断，⑨ 宣称自己能继承圣人的绝学，⑩ 继承的方式是疑经改经，即否认前人对经典的注解，认为儒家经典在流传中次序错乱，需要重新排

①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张岂之修订：《宋明理学史》（中），第 1134 页。

② 方有执编著，陈居伟校注：《伤寒论条辨·或问》，学苑出版社，2009 年，第 266 页。

③ 方有执编著，陈居伟校注：《伤寒论条辨·或问》，第 252 页。

④ 方有执编著，陈居伟校注：《伤寒论条辨·或问》，第 262–263 页。

⑤ 方有执编著，陈居伟校注：《伤寒论条辨·或问》，第 268 页。

⑥ 方有执编著，陈居伟校注：《伤寒论条辨·或问》，第 269 页。

⑦ 方有执编著，陈居伟校注：《伤寒论条辨·或问》，第 268 页。

⑧ 方有执编著，陈居伟校注：《伤寒论条辨·或问》，第 269 页。

⑨ 在《原道》中，韩愈建立一个尧舜禹到孔孟的道统，此后，从程朱到王阳明，理学家纷纷效仿。程颐在孔孟之间增加了曾子和子思（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 25，中华书局，1981 年，第 327 页），朱熹在孟子之后添加了二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序》，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4–15 页），王阳明在朱熹的基础上增补了周敦颐（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 7《文录四·别湛甘泉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257 页）。

⑩ 程颐认为程颢接续了孟子的圣学（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 11《明道先生墓表》，第 640 页），朱熹认为自己继承二程之学（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序》，第 2 页）。

序，以恢复其真面目，[①] 同时寻找一个异端，作为批评和斗争的对象，[②] 在完成这些工作之后，自己也变成了圣人，实现了成圣的人生理想。[③] 这套逻辑可以概括为继绝学而成圣。方有执正是参照这套逻辑，建立错简论的。

（一）拔高仲圣而重建道统

理学是从建道统开始，在错简论上，方有执也是如此。不过，建立医学道统并非始于方有执，自宋代起，医家就用儒家的道统思维来阐释医学的发展。刘完素在称赞张仲景时，就以《伤寒论》比附传说中的儒家经典三坟："夫三坟之书者，大圣人之教也……仲景者，亚圣也。虽仲景之书，未备圣人之教，亦几于圣人。"[④] 杨士瀛用孔孟关系来比喻张仲景与朱肱在伤寒法上的传承："伤寒格法，张长沙开其源，朱奉议导其流，前哲后贤，发明秘妙，吾儒之孔孟矣。"[⑤]

明确参照理学道统来建构医学道统的是明代医家李汤卿。在《原道统》中，他建立了从伏羲、神农、黄帝三皇到张仲景，再到金元医家刘完素、张从正和李杲的统绪，将医之源头归于《素问》，认为扁鹊等人只是得道一二，而张仲景以"大贤亚圣之资，有继往圣开来学之功"，此后医道中断，直到刘完素、张从正和李杲三人出现。[⑥] 医家朱扔概括并发挥了李汤卿的这一思想，将医学道统理学化："儒有道统，医有源流。周孔之道，惟颜、曾、思、孟四传焉。孟子殁后，其传泯矣。轩岐之法，惟长沙太守一人焉。仲景殁后，其法讹矣。寥寥千载之下，能续儒之道统者，程朱二先生而已；能继医之源流者，刘张二先生而已。程朱既出，则周孔之道焕然而复明；刘张既出，则轩岐之法截然而归正。程朱既可与孟子为派，刘张亦可与仲景为俦。"[⑦] 为了与理学道统一对一，朱扔抹掉了伏羲和神农，突出了轩岐和仲景，同时抛弃了李杲。如此一来，轩岐与周孔类比，孟子与仲景等同，程朱与刘张同列。这种整齐的比附，凸显了医学道统建构中浓重的理学色彩。

可见，在明代，医学的道统论已经建立，并获得普遍认可，只不过，不同的道统论在圣人的名录上有所差别，但大多将三皇、扁鹊、张仲景和宋元医家刘完素、张从正等人列入。

相形之下，方有执在道统论建构上表现出了自己的特色，即拔高了张仲景在医统中的地位，认为其"独盛"，张仲景之于医学，相当于孔子之于儒学："医之为道，肇始于《本草经》，阐明于《素》《难》，至《伤寒论》而大备焉……仲景既已首事其间，而乃有是论之作，则其先后

① 疑经改经方面，最有名的莫过于朱熹的编订四书。他从《礼记》中抽出了本来不知作者的《大学》和《中庸》，给它们另定了章句，再为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和记录孟子言行的《孟子》分别做成集注，合成了一套《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学者必读的孔、曾、思、孟四位圣贤的遗书，并主张《大学》在四书中最为重要。参见黄永年：《论韩愈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 年第 1 期。

② 佛老是宋代理学家批评的异端，尽管理学从佛老之学中吸收了大量的资源。朱熹就说："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而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序》，第 15 页。

③ 成圣是理学的人格理想和终极关怀。程颐说："人皆可以至圣人，而君子之学则必至于圣人而后已。不至于圣人而后已者，皆自弃也"，"言学便以道为志，言人便以圣为志。"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 25、18，第 318、189 页。这里的人并非指所有的人，而是帝王和一般学者，不包括下层民众。到了王阳明，将"人"的范围扩至所有人，提出"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满街人都是圣人"的主张。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 2《语录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卷 3《语录三·传习录下》，第 49、116 页。

④ 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宋乃光主编：《刘完素医学全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 年，第 81 页。

⑤ 杨士瀛：《仁斋伤寒类书》卷 1《论变例法当通变》，林慧光主编：《杨士瀛医学全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 年，第 448 页。

⑥ 李汤卿撰，于衡、苏妆校注：《心印绀珠经》卷上《原道统第一》，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 年，第 1–4 页。后来，李梴在李汤卿道统论的基础上，增加了朱震亨、葛可久、陶华、薛己、钱瑛等元明两代的一些医家。参见李梴：《医学入门》卷之首《原道统说》，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年，第 54–56 页。

⑦ 李汤卿撰，于衡、苏妆校注：《心印绀珠经》朱扔序，第 1 页。

《素》《难》而股肱之，其功岂不远贤于神皇轩岐与越人而独盛哉！于是医门尊之以为圣，犹儒门之圣孔子而宗师焉。”[①] 为何张仲景系医界孔子？方有执的解释是，经过张仲景的发展，医学才具备完整的形态——方法：“医道之方法具备，自仲景始，故世称仲景方法之祖”；“昔人论医，谓前乎仲景，有法无方，后乎仲景，有方无法，方法具备，惟仲景此书”。[②] 同时，仲景对医学的影响相当于孔子对儒学的，即有了张仲景，人世间的疾病才有治疗的保障：“朱子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愚每读此书，盖尝窃叹天不生仲景，万病如黑漆耳，医门孔子之称，不有以哉。”[③] 朱熹思想对方有执道统建构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方有执还解释了张仲景为何被称为医圣，是扁鹊和仓公等医神所不及的。他认为，一来，医圣张仲景在医神之上：“夫扁鹊、仓公，神医也。神尚矣，人以为无以加于仲景，而称仲景曰圣”；二来，张仲景发挥了《内经》和《难经》，使医学贯通古今，简单易行，为世人所用：“以仲景之见诸事业，载诸简编者，皆表章天人，股肱《素》《难》，达之天下，通之古今，易简而易知易能。”此外，方有执将《伤寒论》提升到医经的地位，指出《伤寒论》名为“论”，实为医经：“书曰论，何也？论也者，仲景自道也……其文经也，共事则论，其心则以为始事于戚……吾故曰：名虽曰论，实则经也。虽然，若曰伤寒经，殊乖矣，必曰医经。称情哉。”[④] 在医学中，《伤寒论》不仅像儒学中的《论语》和《孟子》，也可近比于《大学》《中庸》，远拟于《春秋》和《周易》：“名虽曰论，实则经也。说者谓医家之有此书，犹儒家之有《语》《孟》。盖以其浑融该博，曲尽精微，恢恢乎足以股肱《素》《难》，而为斯道之日星信矣……近则可以言仿佛《学》《庸》，远则可以议属比《春秋》，而法象乎《易》。”[⑤]

可见，方有执有着自己独特的道统论。虽然，他认同前人关于道统论中三皇的地位，但不认可扁鹊、刘完素和张从正等人，将张仲景的地位拔高，甚至有独尊的倾向。方有执以此为自己继承张仲景之绝学作铺垫。

（二）继承仲圣绝学而重新编次《伤寒论》

建立医之道统之后，方有执就宣称，道统张仲景之后而中断，医道因此衰落，自己受命于天，承担了振兴仲圣绝学的重任：“(《伤寒论》) 惜承流匪人，门墙莫睹，凿者纷纷，注者诺诺，芜秽尘蒙，致束诸高阁，危如一线，有自来矣。”在“身经弊难，死幸重生”后，方有执悟到，上天不让其死，是要其挽救医道，炼石补天，担任子思之于孔子的角色：“天之留我，必有我意，有意于我，其在斯乎……盖道本乎天，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孔氏之有子思，犹夏后氏之有启天也，故道非圣贤不世……若天未欲斯道之一线坠，则必有全天心补天手者出。”为此，他历经千辛万苦，著成《伤寒论条辨》，“庶乎斯道之世，其绵有在，其用有冯，此固吾天天之初心也”。[⑥]

与朱熹恢复儒学经典原貌的方式一样，方有执也怀疑传世的《伤寒论》是经后人篡改的，非张仲景的原本，通过他本人重新编订，《伤寒论》的真相才能重见天日。他指出，《伤寒论》在千余年的流传过程中，因错乱而文理不通，后世注家按此解释，祸害不浅：“盖编始虽由于叔和，而源流已远，中间时异世殊，不无蠹残人弊，今非古是，物固然也。而注家则置弗理会，但徒依文顺释……至历扞挌聱牙，则又掇拾假借以牵合，即其负前修以误后进，则其祸斯时与

---

① 方有执编著，陈居伟校注：《伤寒论条辨・序》，第 2 页。

② 方有执编著，陈居伟校注：《伤寒论条辨・削伤寒例》《跋》，第 228、230 页。

③ 方有执编著，陈居伟校注：《伤寒论条辨・或问》，第 266 页。

④ 方有执编著，陈居伟校注：《伤寒论条辨・引》，第 7 页。

⑤ 方有执编著，陈居伟校注：《伤寒论条辨・后序》，第 293 页。

⑥ 方有执编著，陈居伟校注：《伤寒论条辨・序》，第 4–5 页。在《伤寒论条辨・或问》中，方有执亦有类似的表达，参见方有执编著，陈居伟校注：《伤寒论条辨・或问》，第 273–274 页。

害往日者，不待言也。"《伤寒论条辨》就是要还原《伤寒论》的本相："条辨者，正叔和故方位而条还之之谓也。"① 通过削、改、移、调四种方式，方有执对《伤寒论》做了脱胎换骨式的删改：删掉成无己增加的《伤寒论》第三篇《伤寒例》，把太阳篇改为《卫中风》《营伤寒》和《营卫俱中伤风寒》三篇，将第一篇《辨脉法》、第二篇《平脉法》和《辨痉湿暍病脉证》移在篇后，对其他各篇做了相应的调整。②

（三）反异端而争正统

将异己看成异端，把自家视为正统，再以正邪对立而不能共存的逻辑，对其进行批驳，是理学家的一贯思路。这种思路也形塑了方有执的错简论。方有执经常以理学的逻辑为起点，将之前伤寒家著作作为异端，从而证明自己的《伤寒论条辨》系仲景学说的唯一正统。朱熹的正邪论被方有执作为论据："朱子曰：正意不可无，邪意不可有……昔者杨墨之说横流，乃所愿则学孔子者，孟子一人，卓然之意如是也。愚虽不敏，窃尝愿学孟子之所学矣。以疾厄夺，因愿学仲景。"③ 方有执学习张仲景的目的与孟子学习孔子的相同——反异端。方有执还引用胡安国的说法，论证反对邪说异端对于医道的重要性：仲景之后，医道"危如一线"，正统学说遭到邪说蒙蔽，"胡氏《春秋传》曰：圣人大训不明于后世，皆庸腐学经不知其义者之非尔。信哉言也。呜呼！斯文如此，遂至浇风竞著，正学沉沦，邪说横流，人心日惑……若之何不疾病颠连，札夭接迹。呜呼！世途医道尚可言哉！"④

按照上述逻辑，之前的伤寒各家及其著作基本上是异端。不过，方有执指名道姓地视为异端的医家及其著作不多，有马宗素的《伤寒钤法》、陶华的《伤寒杀车槌法》、朱肱的《类证活人书》。对于它们，必须像孟子斥责杨朱和墨子，周敦颐等人评判佛道一样，竭力批判，以维护张仲景之道："铃（应是'钤'——引者注）捶活人类证者出，而斯道日茅塞矣。继《素》《难》之往辙，难乎其有人焉，非天下之病，是病者有所不幸而然耶，何斯道之至于斯也。嗟呼！七篇不作，杨墨之横流不息也；濂洛关闽之传注不出，尧舜孔子之道家殊而户异也……余何人斯而条辨哉！盖将以为后之有志仲景之堂室者，级阶梯之助云尔也。"⑤ 方有执在著述的另一处，还将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及吴恕的《活人指掌赋》《伤寒例》作为异端：在《神农本草经》《内经》《伤寒论》之后，"正学失传"，邪说横行，"呜呼，钤非邪之首，凿之魁邪，活人，不佁凿邪，类证，巫凿也，捶纲（应是'网'——引者注），漫凿也，例，逆凿也，赋，襘凿也，注解，仆妾之凿耳……难以枚数"。⑥ 这里的"网"指的是陶华的《伤寒截江网》,《伤寒例》本来是王叔和的作品，但方有执将其视为成无己的。朱肱、马宋素、陶华、成无己、吴恕等人都是宋明时期非常有名的伤寒名家，他们的著述颇有影响，但在方有执看来，都是蒙蔽正统医道的邪说，必须除之而后快。

张仲景之后的伤寒学，王叔和是绕不开的人物，宋元以来的医家基本上认同其保存和整理《伤寒论》的功绩。方有执将自己视为张仲景传人，按理说，必须将王叔和打掉，这样他和张仲景之间才没有间隔。然而，值得玩味的是，方有执对王叔和不仅没有否定，而且很尊重，称赞不已。他一方面坦承自己提出的三纲鼎立说——"卫中风""营伤寒""营卫俱中伤风寒"，源于王叔和："叔和类集而编次之，各为一篇，独于太阳，分而为三,一一以辨，标其篇目。夫既以辨标其篇目，则论归重于辨，叔和已得之矣。既分太阳为三篇，则太阳一经归重于三辨，叔和

① 参见方有执编著，陈居伟校注：《伤寒论条辨·跋》，第 230、231 页。
② 参见陈大舜：《伤寒学派形成和发展中的三个关键人物》（二），《辽宁中医杂志》1983 年第 8 期。
③ 方有执编著，陈居伟校注：《伤寒论条辨·或问》，第 266 页。
④ 方有执编著，陈居伟校注：《伤寒论条辨·序》，第 4 页。
⑤ 方有执编著，陈居伟校注：《伤寒论条辨·序》，第 3 页。
⑥ 方有执编著，陈居伟校注：《伤寒论条辨·或问》，第 269–270 页。

已明之矣。”[①] 另一方面，主张因不堪而被他消掉的《伤寒例》系成无己所作，而非王叔和，原因是“贤如叔和，愚意其智不乃尔也”。《伤寒论》能传世，首功在王叔和。[②]

（四）含蓄的成圣追求

泰州学派将理学平民化了，成圣的人生理想不再局限于士大夫，农工商皆可成圣。这对于受限于方伎身份但渴望提升社会地位的医家精英来说，无疑是令人振奋的。在建构错简论的过程中，方有执将医学理论与成圣的人生理想有机融合。

不过，方有执并非直接宣称自己可以成圣，而是通过一套逻辑来呈现自己的理想。首先，大道出自尧舜和孔子等圣人，圣人由天降而伟大："夫道不出自圣人不足以言大。何谓大道？道莫大于尧舜。孔子之赞尧，则曰：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孔子集群圣之大成，子贡之赞孔子，则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由于道同出于天，该逻辑也适于医学，《本草》《内经》《伤寒论》都来自圣人，受天命而作：“《本草》之作于神农氏，继天而立极者也；《素》《难》之作于轩岐越人，启天人之秘也。是论也……乃至预有集斯道之大成，而擅百世宗师之同归者，道不同而同出于天。天者理也，理在人心，无古今方隅之异也。”[③]“天”“理”“人心”“古今方隅”之间的逻辑，显然来自陆九渊的东海西海圣人同心的理论。

其次，他本人是受命于天而继承先圣的医道：“愚于儒，且惮不能，今乃医，何也？天既倓然以医之道勉我，我虽不敏，不敢不勉也。”[④] 天以医道勉一语是指方有执本人及其家人遭到的病厄。根据自述，方有执“以两娶五出，一女四男，皆殇于惊风”，[⑤]“厄苦惨痛，凄凄无聊，客游淮楚，值彼旱疫正炽，适罹其灾，死信宿而重生”，[⑥] 他之所以不死，是因为天降大任——拯救医道：“余以身经弊难，死幸重生，因偶窃目观澜，遽觉猛惊大意瞿然，叹曰：今日之幸何莫非天！天之留我必有我意……尽天尽人尽在我尔，我且致尽于斯，或者其庶几乎？”于是，方有执历经艰辛，撰成《伤寒论条辨》，[⑦] 建立了错简论，如此，“仲景在我，而圣贤之宗风不坠”。[⑧]

简而言之，圣人和大道都出自于天，上天以死后重生，暗示方有执系受命于天，振兴医道。通过《伤寒论条辨》，方有执完成了这个任务，实现了与张仲景同为医圣的人生理想。虽然，这个表述有些繁复而含蓄，但逻辑是很清晰的。

三、喻昌的理学思维与错简论的发展

错简论能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与喻昌的发展是分不开的，甚至，不少人认为，喻昌的贡献大于方有执。而喻昌的发展也与理学思维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喻昌的思路与方有执的没有实质性的差别，也是从建道统到继绝学和疑经改经，再到反异端，最后到成圣。由于时代的不同、个人性格的差异等因素，在错简论体系的建构上，与方有执相比，喻昌表现得简单而直接。

（一）独尊仲圣而重建医统

在道统论上，方有执有独尊张仲景的倾向，但并不否认三皇的地位。而喻昌虽然没有直接否定三皇，但为了进一步拔高张仲景，表现出不认可三皇地位的倾向：“奈何世之业医者，辄艳

---

① 方有执编著，陈居伟校注：《伤寒论条辨·后序》，第 292 页。

② 方有执编著，陈居伟校注：《伤寒论条辨·削伤寒例》，第 228–229 页。方有执还认为，王叔和是张仲景之徒，但二者之间的差距是很明显的。参见方有执编著，陈居伟校注：《伤寒论条辨·痉书》《或问》，第 280、264–265 页。

③ 方有执编著，陈居伟校注：《伤寒论条辨·序》，第 2–3 页。

④ 方有执编著，陈居伟校注：《伤寒论条辨·痉书跋》，第 290 页。

⑤ 方有执编著，陈居伟校注：《伤寒论条辨·痉书》，第 278 页。

⑥ 方有执编著，陈居伟校注：《伤寒论条辨·痉书序》，第 275 页。

⑦ 方有执编著，陈居伟校注：《伤寒论条辨·痉书序》，第 4 页。

⑧ 方有执编著，陈居伟校注：《伤寒论条辨·序》《跋》，第 5、231 页。

而称儒；儒之诵读无灵者，辄徙而言医。究竟无生（主）之衷，二三杂糅，医与儒之门，两无所当也。求其拔类者，长沙一人而已。代有哲人，然比之仙释，则寥寥易于指数，岂非以小道自隘，莫溯三氏渊源乎？”①从医者以儒做掩饰以及儒者落第习医的风气，喻昌推出医界“出类拔萃”者仅张仲景一人的结论，认为将医学追溯到三皇身上，是医界“自隘”的表现。

这种说法未免过于反传统。将三皇纳入医统，得到国家和社会的认可，是宋代以来医界无数人不断努力的成果，其间遭到不少士大夫的批评和反对，②虽然这在现实中对于提高医家地位，实效不大，但在医家的精神层面，意义不小。在这里，喻昌显然不认可医界先贤的成绩，像反对者一样，指责这种操作。③当然，这样做也是为了独尊张仲景，因为不认可三皇，医统的圣人谱系中就仅剩张仲景了。

可见，与方有执相比，喻昌在道统论上走向极端，独尊张仲景。同时，喻昌没有复杂的论证，而是直接宣称。

（二）继仲景之绝学而继续编次《伤寒论》

与方有执一样，喻昌之所以无限拔高张仲景的地位，就是为自己打造继绝学的角色作铺垫。

喻昌主张，自轩岐发明医药以来，仓公和扁鹊继承，此后医道衰落，后继无人：“轩辕帝尊其臣岐伯为天师，每闻典要，心载拜敬受，金匮玉函，珍藏其文。由兹神工继起，仓扁而下，代有传人……挽世道降术升，医事之不振久矣。”④医经《伤寒论》却因后人编次而价值不再，重振医事的关键在于揭开《伤寒论》的真面目，承担此重任者只有他本人：“昌一人即身为标，言为的……尝慨仲景《伤寒论》一书，天苞地符，为众法之宗，群方之祖。杂以后人知见，反为尘饭土羹，莫适于用。兹特以自然之理，引伸触类，阐发神明，重开生面，读之快然，觉无余憾。”⑤喻昌的此类表达不止一次：“今天下医脉久断，医学久荒，即欲效司马子长提簦负笈，遍访于江淮汶泗，而师资果安在乎？昌于斯世，无地可以着锥，然而皇皇斯人，不敢自外，请一比类，为后学商之。”⑥

与方有执不同的是，喻昌严格按照继绝学的逻辑，除了方有执外，对王叔和以来所有伤寒家点名道姓，一一否定：王叔和将《伤寒论》“附以己意，编集成书”，造成“学者童而习之，白首不得其解”。至于“庞安常、朱肱、许叔微、韩祗和、王实之流，非不互有阐发，然不过为叔和之功臣止耳，未见为仲景之功臣也”。当时流传的《伤寒论》系林亿和成无己所注，“殊不知林、成二家，过于尊信叔和，往往先传后经，将叔和纬翼仲景之辞，且混编为仲景之书，况其他乎！”⑦简而言之，传世的《伤寒论》首先是王叔和编次的，王叔和错了，后来的林亿和成无己不可能正确，这些自许为张仲景的继承者，实际上接续的是王叔和。对于方有执，喻昌肯定少，否定多：“其于太阳三篇，改叔和之旧，以风寒之伤营卫者分属，卓识超越前人”，但也认为削掉《伤寒例》，实属过激，“此外不达立言之旨者尚多”。在评述前人之后，喻昌提出自

---

① 喻昌：《寓意草·自序》，陈熠主编：《喻嘉言医学全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 年，第 371 页。

② 关于宋元以来三皇庙的出现和发展，以及医界为此的努力和士大夫的批评，学界已有详论，参见马明达：《元代三皇庙学考》，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等编：《暨南大学宋元明清史论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279−294 页；荣真：《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研究：以三皇和城隍为中心》，中国商务出版社，2006 年，第 172−173 页。

③ 虽然在明代，张仲景已经取得圣人的地位，但医界并不因之否定三皇在医学道统中的地位，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卷 1《历代圣贤名医姓氏·五帝》，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 年，第 1−3 页）和李梴《医学入门》（卷之首《历代医学姓氏·上古圣贤》，第 17 页），都从三皇说起。关于仲圣的生化过程，参见余新忠：《医圣的层累造成（1065—1949 年）——“仲景”与现代中医知识建构系列研究之一》，《历史教学》2014 年第 14 期。

④ 喻昌：《尚论篇·自序》，陈熠主编：《喻嘉言医学全书》，第 3 页。

⑤ 喻昌：《尚论篇·自序》，陈熠主编：《喻嘉言医学全书》，第 3 页。

⑥ 喻昌：《医门法律》卷 6《胀病论》，陈熠主编：《喻嘉言医学全书》，第 347 页。

⑦ 喻昌：《尚论篇》卷首《尚论仲景〈伤寒论〉大意》，陈熠主编：《喻嘉言医学全书》，第 7−8 页。

己编订《伤寒论》的思路："诚以冬春夏秋，时之四序也。冬伤于寒，春伤于温，夏秋伤于暑热者，四序中主病之大纲也。举三百九十七法，分隶于大纲之下，然后仲景之书，始为全书……至伤寒六经中，又以太阳一经为大纲，而太阳经中，又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①] 这就是著名的三纲鼎立学说。

对于喻昌编次《伤寒论》路数及其渊源，清儒已有认识。焦循说："自赵宋人删改《六经》，其害遂及于医……喻昌……改'里有寒，外有热'为'里有热，外有寒'，方中行、程郊倩之流，移易本文，无知妄作，而医学乃紊矣。"[②] 显然，焦循不认可喻昌的做法，无论这种批评是否正确，它都反映了错简论与理学的密切关系。

（三）彻底地反异端与唯我正统

方有执只是笼统地否定前贤，对于其中关键的人物朱肱、成无己等人也是点到为止，对王叔和还尊敬有加。喻昌就不同了，他把方有执之外前贤全部否定，打入异端，以严厉的措辞批驳，尤其是对王叔和，更是不遗余力。为此，他撰写《尚论仲景〈伤寒论〉大意》《尚论仲景〈伤寒论〉，先辨叔和编次之失》《尚论仲景〈伤寒论〉，先辨林亿、成无己校注之失》《驳正王叔和〈序例〉》《论春温大意，并辨叔和四变之妄》《详解温疫，以破大惑》六篇文章，并将其置于《尚论篇》"卷首"。第一篇《尚论仲景〈伤寒论〉大意》，对晋代以来的注家王叔和、林亿、成无己、庞安常、朱肱、许叔微、韩祗和、王实、程德斋、王履、方有执等人逐一点评，除了方有执，其他人都被否定。在这些注家中，王叔和与成无己最为有名，王叔和保存和整理了《伤寒论》，宋代以后的底本系林亿在王叔和注本基础上校正的，成无己用《内经》对《伤寒论》做了全文注释。也就是说，王叔和本为底本，林亿本是宋代以后的传世本，成无己本系权威。喻昌要推翻之前的伤寒学说，就必须重点反驳这三家，特别是王叔和。因此，后面的五篇文章对他们分别辩驳，其中，《尚论仲景〈伤寒论〉，先辨林亿、成无己校注之失》一文，分析了林亿和成无己校注的失误，其余四篇都是反驳王叔和的。[③]

喻昌毫不客气地全盘否定王叔和、林亿和成无己三家。对于前两家，他指出了"补缀"造成的混乱和不通，以及将脉法和序例置于全书一、二卷的重大失误，批评他们目光短浅，头脑昏庸："是二家羽翼叔和以成名，比以长君逢君，无所逃矣。至其注释之差，十居六七。夫先已视神髓为糟粕矣，更安望阐发精理乎！"[④] 至于王叔和，在喻昌看来，无德无才，祸害巨深："碎剪美锦，缀以败絮，盲瞽后世，无由复睹黼黻之华。泥于编述大意，私淑原委，自首至尾，不叙一语。明是贾人居奇之术，致令黄岐一脉，斩绝无遗。"《序例》系王叔和杜撰，危害甚大，喻昌逐条反驳。不过，抨击前贤还是有道德压力的，所以，文首做了解释："非故攻击前贤，实不得已之思耳。"到文尾，喻昌全然不顾，以反异端的口吻，指责王叔和意在炼石补天，却造成医道的衰落，认为对其挞伐理所当然："其插入异气，蔓衍繁文，诚何心哉！岂以仲景所无，炼石足补天缺耶！则自勒一家言，另纬其后，听人之从违可耳。乃造不经之说，混乱经常，至经常大义，不挈一语，以此网罗英贤，悉入彀中，其授受之途，盖已千年长夜矣！有志跻仲景之堂者，能无大剖叔和之藩也哉！"[⑤] 其实，所谓王叔和"炼石补天"，纯系子虚乌有。张仲景的圣化是宋代以后的事情，在汉末魏晋时代，单从身份来看，王叔和是御医，张仲景仅为民间医生，

① 喻昌：《尚论篇》卷首《尚论仲景〈伤寒论〉大意》，陈熠主编：《喻嘉言医学全书》，第 7–8 页。

② 陈局渊主编：《雕菰楼文学七种·雕菰集》卷 50《医经余论序》，凤凰出版社，2018 年，第 360 页。

③ 喻昌：《尚论篇》卷首，陈熠主编：《喻嘉言医学全书》，第 7–17 页。

④ 喻昌：《尚论篇》卷首，《尚论仲景〈伤寒论〉，先辨林亿、成无己校注之失》，陈熠主编：《喻嘉言医学全书》，第 8–9 页。

⑤ 喻昌：《尚论篇》卷首，《尚论仲景〈伤寒论〉，先辨林亿、成无己校注之失》，陈熠主编：《喻嘉言医学全书》，第 8、9、14 页。

甚至有草泽铃医之嫌，[①] 前者的社会地位比后者的高出不少。在此情形下，“炼石补天”无从谈起。不过，反异端的观念，蒙蔽了喻昌的常识性思维。

可见，在反异端与维护正统上，与方有执相比，喻昌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几乎将先贤全部打入异端，唯独自己正确。言下之意，只有自己才是张仲景的继承者。

（四）明确的成圣追求

在成圣追求上，方有执是很含蓄的，他通过复杂的论证来表现。喻昌则直言不讳，直接宣称，在《尚论篇》恢复《伤寒论》的真相之后，自己即可与圣人同列：“是编聊引其端，等诸爝火，俟夫圆通上智，出其光华，于以昭彻玄微，与黄、岐、仲景而合辙。”[②] 直接宣布自己成圣，在医界史无前例，未免骇人，所以，《清史稿》评价喻昌“不可一世”。[③]

喻昌因之遭到后人的批评。在评述方有执、喻昌和程应旄的错简论时，晚清医家陆懋修说：“三家中，喻之才最大，其笔最利，其私心亦最重。”[④] 这里的“私心”，就指喻昌表面上维护张仲景之道，实际上自己要成圣的心理。

四、理学思维与错简论的影响

错简论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医界认为，它开启了伤寒学内部的学派之争。这已是常识，无须赘言。在这里，我们从理学思维的视角，想进一步追问，错简论何以能对后世医学产生巨大的影响？

从方有执和喻昌的建构思路可以看出，错简论之所以与之前的伤寒学不同，除了对《伤寒论》进行重新编次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将医家的人生理想寓于医学创新之中。易言之，在提出新理论的同时，医家实现了个人的人生理想——继绝学而成圣。

在重新编次《伤寒论》、提出医学新理论的同时，方有执和喻昌认为自己继张仲景之绝学而成为圣人。这种套路被清代医家精英纷纷效仿，徐大椿、黄元御、陆懋修等人表现得尤为明显。

徐大椿就明言：“自南阳夫子以后，此道渐微。六朝以降，传书绝少。迨唐人《外台》《千金》，不过褒（裒）集古方，未能原本《内经》……至于近世，则惟记通治之方数首，药名数十种……余深悯焉。兹书之所由作也，本《内经》以探其源，次《难经》及《金匮》《伤寒论》以求其治。其有未备者，则取六朝唐人之方……庶几古圣治病之法，尚可复睹，使学者有所持循，不至彷徨无措。”[⑤] 黄元御更加直言不讳：“无何稿脱书清，事竣业就，遂作岐伯之高弟，黄帝之功臣”；“医有黄帝、岐伯、越人、仲景四圣之书，争光日月。人亡代革，薪火无传，玉楸子悯后世作者不达其意，既解《伤寒》《金匮》，乃于己巳二月作《四圣心源》，解内外百病，原始要终，以继先圣之业。”[⑥] 晚清陆懋修依然梦想作仲圣传人，只不过，这种心理是由他的弟子表述的：“夫医学自宋元以来荒芜秽杂，人自为书。其书愈多，其道愈晦。得吾师起而廓清之，庶晓然于微言未绝斯道，大有传人。苏子瞻称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轸于吾师之所以论医者亦云。”[⑦]

---

① 一些文献记载，张仲景系长沙太守，这很有可能是后人添加的。参见余新忠：《医圣的层累造成（1065—1949 年）——“仲景”与现代中医知识建构系列研究之一》，《历史教学》2014 年第 14 期。

② 喻昌：《尚论篇》自序，《尚论仲景〈伤寒论〉大意》，陈熠主编：《喻嘉言医学全书》，第 3-4 页。

③ 《清史稿》卷 502《列传 · 艺术一 · 喻昌传》，中华书局，1977 年，第 13868 页。

④ 陆懋修：《文十六卷》卷 9《论王叔和〈伤寒序例〉》，王璟主编：《陆懋修医学全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 年，第 69 页。

⑤ 徐大椿：《兰台轨范 · 序》，刘洋主编：《徐灵胎医学全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 年，第 209 页。

⑥ 黄元御：《素问悬解 · 自序》，《四圣心源 · 自叙》，孙洽熙主校：《黄元御医学全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 年，第 7、683 页。

⑦ 陆懋修：《〈伤寒论〉阳明病释四卷 · 跋》，王璟主编：《陆懋修医学全书》，第 172 页。

徐大椿、黄元御和陆懋修各自的说法不一，然而，其逻辑与方有执和喻昌的是何等相似。他们都志于继绝学而成圣，认为医学自张仲景之后衰落了，只有自己才是力挽狂澜而传承医道之人。因而，对于张仲景之后的医学理论，大多持否定态度，无限拔高自家学说。伤寒学的百家争鸣由此形成。可见，寓人生理想于理论创新之中，是错简论能对后世医学产生深远影响的观念因素。

五、结语

错简论的出现是以宋元以来伤寒学的发展与明代理学的平民化走向为历史背景的。宋代政府组织的医籍整理，印刷术带来的医学知识开放，其实还要加上张仲景的圣化运动，促成了宋元以来伤寒学研究的发展。到错简论出现之前的明代前中期，取得巨大的成绩。然而，这种以权威文本为基础的研究，主要是章句训诂的，它愈来愈限制了医学理论的突破，引发了一些医家的不满。他们开始批评此类注解方式，认为王叔和、成无己等人把自己的看法掺入了《伤寒论》，从而蒙蔽了张仲景原本的真相。这些批评给方有执和喻昌建构错简论提供了直接的启发。这是错简论出现的医学背景。而泰州学派的平民化走向，则是错简论出现的文化背景。泰州学派主张“百姓日用之道”的思想，一方面将衣食住行的物质需求作为道的中心内容，另一方面把农工商纳入成圣的范围。这样，作为“生生之具”的方伎——医学，被融入了理学，医家也可将成圣作为人生理想了。这就为方有执和喻昌以理学思维搭建错简论提供了理论资源。

出身理学的方有执，因病从医后，将理学思想带入医学理论之中，经常用儒家思想佐证自己的观点。不过，在错简论建构上，他并非简单套用某种理学思想，而是吸收了建道统、继绝学、疑经改经、反异端和成圣等一系列理学思维。理学家先建立道统，树立一些圣人；然后主张圣学从某位圣人处中断而成为绝学，宣称自己是继承绝学的不二人选；再以通过恢复圣学的原貌为旗号，对儒家经典进行怀疑和改造，同时，将佛老打入异端，作为斗争的对象，以凝聚人心。在此过程中，他们也实现了成圣的人生理想，进入道统的圣人谱系。方有执的错简论就是参照这样一套思维逻辑来建构的。他也是先建立独尊张仲景的道统，主张张仲景之后《伤寒论》因为后世医家的错误解释和整理，真相被遮蔽了，成为绝学，医道危如一线。他宣称自己受上天委托，是肩负拯救医道、振兴绝学、恢复《伤寒论》本相的唯一人选。他恢复的方式，就是调整《伤寒论》的篇目次序，删改部分内容，撰成《伤寒论条辨》，提出一套新的伤寒学说。同时，为了维护自己的正统地位，他把著名的伤寒家朱肱、成无己、陶华等视为异端，全面否定。不过，他否定的方式比较温和，点到为止。有意思的是，对于整理《伤寒论》的第一人王叔和，方有执不仅没有打入异端，而且非常尊重，视其为张仲景之徒，承认错简论中的三纲学说源于王叔和。通过这些努力，他也变成了接续医学道统的圣人。对于自己的圣人地位，他并非简单宣称，而是做了一系列逻辑论证，黄帝、张仲景等医圣及其著述都出于天，他自己也是受上天委命，拯救医道，故而也是圣人。

错简论在方有执发明后，喻昌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喻昌的思路与方有执的没有实质性的差别，也是建道统、继绝学、疑经改经、反异端和成圣的一套逻辑。不过，由于时代的不同，性格的差异，在错简论完善的过程中，喻昌表现得简单而直接。明后期，理学大盛，方有执受到的影响很大，他经常将其作为论证医论的依据。而到了《尚论篇》成书的清初，理学背负了“清谈误国”的罪名而遭到批评，同时，方有执已经完成了错简论的理论体系建构，喻昌对其的完善无须再借助理学。所以，在《尚论篇》中，理学理论的表述无迹可寻。然而，这并不等于喻昌抛弃了理学思维，相反，在发展错简论的过程中，他的思维逻辑更加理学化。在医统的圣人谱系中，方有执认为张仲景“独盛”，但承认三皇，喻昌则表现得更极端，怀疑三皇，仅承认

张仲景。同时，喻昌明确表示自己是张仲景之后继承医统的唯一人选，从王叔和到成无己，都是异端，即使错简论的发明者方有执，也是成少败多。如此一来，喻昌在《伤寒论》的整理上，不必在乎前人，完全自作主张。在成圣问题上，他没作任何铺垫，直接宣称自己可以与黄帝、张仲景并列。可见，同样受理学思维影响，方有执与喻昌在错简论建构上表现的差异较为明显，总体来看，方有执比较含蓄、温和，经常依赖于理学理论，而喻昌则简单直接，表面上不引用理学，但思维更加理学化。

错简论对清代医学影响巨大，究其原因，除了它的医学学理因素之外，观念因素也不容忽视。错简论寓人生理想于医学创新之中，为医家精英精神升华提供了宝贵资源。易言之，在医学发展中，医家可以做到医学创新与成圣两不误，这就是错简论能对清代医学产生巨大影响的观念因素。

梁其姿指出，相比西方医疗史，中国医疗史还很不成熟，其表现之一就是医疗史与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之间的联系还没有被揭示出来。[①] 本文的研究显示，从理学的视野出发，传统医学与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关联可以得到清晰的呈现。

References

Chen Lai. “Taizhou xuepai kaichuang minjian ruxue jiqi dangdai qishi” (Taizhou School initiates folk confucianism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Jianghai xuekan* (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1 (2020)

Yu Xinzhong. Yisheng de cenglei zaocheng (1065−1949) :Zhongjing yu xiandai zhongyi zhishi jiangou xilie yanjiu zhiyi (The buildup of sage of medicine (Yisheng) from 1065 to 1949:“Zhongjing” and the knowledg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Lishi jiaoxue* (History Teaching)14 (2014).

Hou Wailu, Qiu Hansheng, Zhang Qizhi eds. Zhang Qizhi Revised. *Songming lixueshi* (History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Xi’an: Xibei daxue chubanshe. 2018.

Tracing the Lost Learning to Become a Sage: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ism Thinking and Misconception Theory

ZHANG Tianshe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zhangtsh1977@163.com)

Abstract: The rise of interest in the textu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since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and the beginnings of skepticism toward the classics, as well as the rapid spread of the “popularization” movement of the Taizhou School in late Ming times, all these constitute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for the emergence of “misconception theory.” Fang Youzhi had established a system of misconception theory by consulting the Confucian classical tradition, by following the “original studies” movement, questioning the classics, and improving the classics, opposing irrational schools of thought and becoming a sage. In this system, Fang Youzhi elevated Zhongjing to the status of a sage, claimed that Zhongjing’s medicine had been cut off and so was a lost as a source of medical learning. He restored its original status by compiling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In this way he had inherited the lost learning. At the same time, to maintain his orthodoxy, he treated Cheng Wuji and other doctors as quacks, and finally claimed himself to be a sage. Yu Chang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dapted the system of misconception theory by making it compatible with Neo-Confucian thought. Misconception theory introduced innovations in medical theory by adapting it to the career ideals of the practitioners. It was this factor that had a major impact on medicin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Neo-Confucianism, misconception theory, Fang Youzhi, Yu Chang, construction

---

① 梁其姿：《为中国医疗史研究请命（代序）》，《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 页。